

论《西游记》的政治悲剧内核^{*}

刘玲玲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1106)

摘 要:从政治视角来阐释《西游记》的主题,认为《西游记》表现出了明显的文学政治性,看似无意识的环境描写、意象刻画、人物命运安排乃至作品前后的矛盾,都通过一种政治隐喻的方式揭示了作品的悲剧性。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西游记》文学创作悲剧性制度根源。

关键词:《西游记》;文学政治性;悲剧性

中图分类号:I207.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33X(2017)03-0032-03

对《西游记》主题的探讨一直是见仁见智,解读视角、个人经历以及切身感悟的不同,都会影响对其主题的认知。历来专家学者对《西游记》主题解读的视角各有不同,观点上也颇有争议,“或云劝学,或云谈禅,或云讲道,皆阐明理法,文词甚繁”^{[1]115}。本文旨在从政治的视角来解读《西游记》。

一、《西游记》的文学政治性

政治往往寓于文学,文学则侧面反映政治。一部文学作品虽然不能准确地展现一段历史,更不能全面地反映一种政治制度,特别是像《西游记》这种假借了一些虚构的超自然事物的文学作品,更不能说它反映了历史事实,但是文学作品蕴含的政治性或者说政治影响却是客观存在的。文学作品中政治的影子常常并不是作者有意去安排的,可能只是一种应机、习惯性地展示。在这种无意识中,完整的政治框架所具有的内在联系往往分散在作品的各个角落里,被那些以独立姿态出现的语句或加以粉饰的形式所遮掩。但是,这并不妨碍人们从作品的整体架构或只言片语中去发掘文学作品创作的政治痕迹。站在历史的长河中回眸,将特定的背景与特定的文学作品相结合,可以发现一些惊人的吻合,并且有理由相信这不仅仅是巧合,而是当时的政治制度对人们思想行为影响的必然结果。

《西游记》就带有明显的文学政治性。将文学与政治联姻本身就不会是只关风月的吟咏,而是忧思深远的慨叹。吴承恩在志怪小说《禹鼎志》序里说道:“虽然吾书名为志怪,盖不专明鬼,实记人间变

异,亦微有鉴戒寓焉。”^{[2]159}可见作者善于寓世间百态于满天神佛,以影射亦真亦幻的人间社会,并以此为鉴。这就表现出一种政治隐喻,“政治现实本身就是由隐喻组成的,进而以政治修辞来传递信息”^[3]。看似无意识的环境描写、经典意象的刻画、人物命运的安排以及作者所宣扬的观点,甚至是作品中前后的矛盾往往都是作者心中愿景和现实之间的矛盾交织的产物,都打下了一个时代政治的烙印。

二、《西游记》人物命运的悲剧性

习惯于接受官本位思想,习惯了做奴性的顺民,是难以意识到《西游记》中悲剧色彩的。只有用哲学的思辨剥开其外衣,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才能体会其中的凄婉哀鸣。

(一) 孙悟空的悲剧性

孙悟空通向极乐的天堂之路,也就是自我泯灭的灰烬之路。孙悟空是个不折不扣的反叛者,不服生死,搅龙宫、闯地府、闹天宫,叫嚣玉帝,无视诸佛,天地不拘,却是一个悲剧英雄。他本不直接反抗制度,“在本质上,孙悟空这只猴子反抗的只是权威,藐视的是尊严,要求的是自由,放纵的是个性”^{[4]87-88},但他却做了该制度下最大的牺牲品。他的放荡不羁、桀骜不驯在天庭看来是一种挑衅和威胁,天庭不会容忍这样一种“人”胡作非为、威胁统治。既然他的存在已然对现行体制带来了威胁,就注定不为当时的体制所容,注定只会是一个悲剧英雄。“招安”这个词在《水浒传》里见到最多,在《西游记》里虽是昙花一现,却是悲哀的源起。当太白金星三番五次地

^{*} 收稿日期:2017-01-20;修订日期:2017-02-20

作者简介:刘玲玲(1992—),女,安徽合肥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行政管理方面的研究。

去请孙悟空去天庭做官时,天庭的政治戏码就开始上演,悲剧就慢慢拉开帷幕。如果说五行山只是限制了孙悟空躯体的自由,剥夺了他五百年的自由;那么取经之路以及那个“紧箍”给孙悟空带来的就是永远的思想禁锢,给了他千年万年的思想奴役。孙悟空天真地以为踏上取经之路就可以换来过往的自由,可他走得太远了,他的思想被一点点侵蚀,叛逆被一点点驯服,失去了自由意志和反抗精神。

(二) 唐僧的悲剧性

对于唐僧的角色,胡光舟的观点较为犀利。他在《吴承恩与〈西游记〉》中说道:“他(唐僧)懦弱无能,胆小如鼠,听信谗言,是非不分,自私可鄙,优柔寡断,昏庸糊涂……他既不是精神力量,也不是实际的战斗者,竟是一个百分之一百的累赘,至于他在取经事业中的作用,说得不客气些,应当是个负数……”^{[4]115}从政治视角来看,唐僧这一形象何尝不是被精心打造出来的用以驯化世人的典型呢?他前世曾是不可一世的金蝉子,轻蔑佛法,无视佛祖权威,身于佛门之中却敢于质疑佛法,他的反叛精神绝不亚于孙悟空。现世却成为一个集三教义理于一身的完美取经人和驯化世人的典型,既有忠君爱国的儒生情怀,又深谙参禅悟道之法。与其说“三藏”之名来源于三藏大乘佛法,倒不如说这“三藏”正是儒释道三者藏于一身的谏语。唐僧前世的反叛不羁与现世的唯唯诺诺产生了鲜明的对比,一场转世投胎,他忘记了质疑和反抗,成为一个彻头彻尾顽固迂腐的佛法教义的捍卫者和坚守者,成了统治者驯化世人的“取经人”和“代言人”。这是一种何其的悲哀?唐僧与孙悟空不同,孙悟空本就是体制外的人,而他却是体制内的人,他的这种反叛的归附与孙悟空对体制的屈服,向人们全面地阐释了体制强烈的不可触抗性。

(三) 妖魔鬼怪的悲剧性

古往今来裙带妖魔作怪现象屡见不鲜,但是各种降妖伏魔最后打击的往往只是没有牵丝扳藤、被迫无奈的小妖小吏,有后台有背景的依然逍遥法外。网上有句话说“有后台的妖精都被接走了,没有后台的妖精都被乱棍打死了”,仔细看来确实如此。同样是妖精,那些从天庭神仙下界为妖的都可以得到原谅和救赎,而那些自己占山为王的妖怪都被乱棍打死了。事实上,那些“有后台妖精”只是统治者实现阶级统治的棋子,代替统治者做他们想做而又不能做的事,没有自主性、更没有自由可言。那些“草莽妖精”则是这些错事的替罪羊,用它们的死来弥补取经路上的坎坷和艰辛,安慰世人不平之心。这两种妖精本质属性没有差别,只是被贴上了不同的标签,处在了不同的阶层。从某种角度来讲,“草莽妖精”的种种行径不过是为了

弥补身份背景的差异,希望通过修炼、乃至是吃“唐僧肉”的方式以实现从较低阶层到较高阶层的地位转化。同样是为祸人间、阻碍取经,有后台的妖精的这种“纯粹为了刁难而刁难”的行为就是帮助历练唐僧师徒,是功德一件;没有后台的妖精的这种“为了改变生存现状”而采取的行为倒是罪大恶极,死不足惜。善恶是非的标准因其身份背景的差异而差异化,这是“草莽妖精”的悲剧所在。

三、《西游记》文学创作的悲剧性根源

《西游记》的悲剧主要源于统治者采取的软硬兼施的统治手段,一边施以硬性的强制性权力,一边辅以软性的文化奴役。底层民众在无力改变现实的状况下,只能转而寄托于幻想一种近乎完美的大同世界以自我陶醉。明清是中国封建制度的末期,却也是封建制度对人性压抑的顶峰。正是封建制度这种“内腐”让封建统治变得岌岌可危,统治者们才不得不加强政治对人的统治,通过一系列整脚的形式主义来框住这个日益异化的、“蠢蠢欲动”的社会。由儒学演变发展而来的程朱理学逐渐背离其真髓、失去活力,呈现出日益僵化腐败之势,成为社会发展和人心自由的羁绊。

(一) 强权约束

唐僧用以驯服孙悟空的“紧箍咒”绝非一般的事物,它具有工具性、约束性、强制性,是孙悟空完全无力抵抗的外在力量,是封建体制下绝对强权的体现。如来传咒于菩萨,菩萨传咒于唐僧,这正是个逐级授权的过程。然而这种权力的诞生有着与生俱来的缺陷。一则,权力来源于传统型权威,其本身的合法性基础相对薄弱。二则,佛祖对菩萨授权,菩萨对唐僧授权仅凭自己意愿,没有合法的授权依据。三则,菩萨授予了唐僧权力,却没有对权力设置相应的规则,没有做到权责同授。仅仅是依靠单纯的道德和信任来维系这种权力的运作,这样的权力是脆弱而不稳定的。“唐僧会不会滥念咒语,一唯良心是视,既没有法律可循,而又不受任何掣肘,不用承担相应的责任就缺乏了对权力滥用的惩戒,一切问题都是由此发生”^{[5]99}。四则,没有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所以当肉眼凡胎的唐僧误会孙悟空而滥念咒语的时候只能不了了之,吴承恩在这里已经触到了“中国封建制度的一个弊病:权力的缺乏制约和人治因素”^[6]。

(二) 文化奴役

文化奴役直接表现为儒道互补、儒佛互证,以道释儒,以儒统道,三教合归儒,共同维护封建统治。《西游记》里大致可以将世界分为三个部分,人界、仙界、佛界,正好对应着儒、道、释,这相对应的三者之间

有着“相同的等级秩序、对等的价值尺度、相同的游戏规则、运作机制,从而表现出共同的本质特征”^{[7]89}。“圣”也好,“佛”也好,“仙”也好,都是一种统治者所希冀的“理想人”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下的人思想完全与统治者所需要的相一致。佛教实际上是主张人们“安于封建统治的奴役环境,用清净沉思、忍受屈辱的方法达到‘大彻大悟’,以享受来世的欢乐”^{[4]100},所以“佛法”成为强大的封建纲常礼教的化身。得道成仙的天庭则是人间朝廷的投影,不论是机构设置、人员配备,还是运作方式,两个朝廷并无实质性的差异,所尊奉的都是儒家的伦理纲常。道家的“元会运世、天干地支、阴阳五行、四象八卦均粉墨登场,担当起解释儒家义理的‘形而上者’的重任”^[8]。所以“三教可以归一,三教也必须归一,只有这样才可以共同致力于维护封建统治;归一是以儒为主体,以释道作为补充的整合与杂糅,儒高于释,释高于道”^[8]。

(三) 理想世界

在统治者软硬兼施的统治手段下,底层民众已经成为了一群没有反抗实力和反抗意识的政治冷漠群体,安于封建统治的奴役环境,用清净沉思、忍受屈辱的方法达到“大彻大悟”,以享受来世的欢乐。他们依旧怀有对美好世界的愿景,却不是希望通过摧枯拉朽的方式来进行变革,而是仅在意识中勾勒出一个大同世界,以寄托自己的美好愿景。所谓的花果山福地,只是百姓心中的世外桃源和乌托邦式的蓝图。人民希望安定快乐简单的生活,小国寡民的社会,天下为公的理想信念,没有压迫,超越生死,不受自然限制;同时又希望有仁德的君主来统治,有一套不可僭越的礼乐制度,像人间的朝廷里一样齿序排列,就连极具想象色彩的动物世界中,也逃不出“大王”这一称谓,只能感慨,封建关系对百姓的影响早已深入骨髓。单从古代的文人走不出君君臣臣的关系,就可以看出他们走不出封建关系,由于思想的局限,他们所向往的理想世界不是打破现有的体制,而是寄托于一个贤明

的君主统治下的现有体制良性运行的世界。

四、结语

作者在文中并没有明示过自己的思想情感、政治立场、道德观念,只是通过对《西游记》中不同人物的命运的安排阐释了在当时的背景下,只有做政治上的顺民才能功德圆满,只有安于封建统治的奴役环境,用清净沉思、忍受屈辱的方法达到“大彻大悟”,才能享受来世的欢乐。如果给《西游记》安排另一个结局,让孙悟空得了天庭,那也一定是个悲剧。就像陈胜吴广一样,新的政权迅速封建化、腐朽化,而新的天庭也会变得和以前的天庭一样。逃不出固有的政治体制,受制于传统的思想观念,任王朝是谁的天下,都是同样的封建,不容践踏,即使是孙悟空得了天庭,在那样的大背景下,也会是悲哀结局,只是悲哀程度不同罢了。作者这种没有政治倾向上的承诺的表现,正是当时政治背景下,文化潮流、思想意识在文学上投影的表现,又是另一种“贾雨村言”的暗讽。

参考文献:

- [1]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2] 吴承恩. 禹鼎志·序[C]//朱一玄,刘毓忱. 西游记资料汇编.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
- [3] 王婧. 政治隐喻的批判性研究[J]. 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4):66-68.
- [4] 胡光舟. 吴承恩和《西游记》[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5] 萨孟武. 《西游记》与中国古代政治[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6] 蔡铁鹰. 读懂《西游记》[J]. 运城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5):25-30.
- [7] 徐杨尚. 明清经典小说重读——寻找失落的传统[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 [8] 单继刚. 《西游记》中的儒释道观[J]. 明清小说研究,2000(1):98-113.

On the Political Tragedy of *Journey to the West*

LIU Lingl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211106,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veal a tragic theme of *Journey to the West* from a political perspective. *Journey to the West* is born with a clear literary politics. Seemingly unconscious description of environment, contradictory images depiction, the character's fate and even the paradox of the content all refer to a tragic motif by a way of political metaphor. On this basis,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origin of the tragic system of the literary creation of *Journey to the West*.

Key words: *Journey to the West*; literary politics; tragic nature

(责任编辑:徐习军 实习编辑:范威风)